

世紀末中國

鄧 小 平 續 局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鄧小平之後的中國)
by WILLY WO-LAP LAM

譯者 / 塗百堅・陳怡如

世紀末中國

鄧小平續局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有关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内容主要分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部分。国际贸易部分主要介绍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管理措施、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部分主要介绍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外汇交易业务与外汇风险管理。此外,每章还给出了案例以供分析。

本书在内容设置和结构上作了一些探索,吸收了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学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学习国际经贸知识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胡国松主编.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8

石油高等院校经管类特色教材

ISBN 978-7-5021-8579-4

I. 国…

II. 胡…

III. ①国际贸易-高等学校-教材

②国际金融-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74②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822 号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www. petropub. com. cn

编辑部:(010)64523612 发行部:(010)645236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石油报印刷厂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开本:1/16 印张:20.75

字数:530 千字

定价:3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備受爭論的鄧小平身後遺產

15

第二章 經濟改革

——資本主義道路能走多遠？

107

第三章 毛澤東思想的反撲

——階級鬥爭與抗拒改革

225

第四章 人民解放軍

——老鄧的鋼鐵長城

307

第五章 政治改革叫停

——黨如何強化獨裁統治

379

第六章 政治傳承及後鄧時期的領導權

497

第七章 鄧小平死後的中國

573

前言

萎縮的中國社會主義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中國更爲穩固地邁入九五年後鄧小平時代後，對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現代中國的締造者）的這些話有著奇妙的回應。

中國革命方向的問題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場針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鄧小平思想研討會中，由中共元老薄一波(Bo Yibo)尖銳的指出。薄，前副總理，審視了中共過往七十四年，嘗試將社會主義移植到中國土壤，以實現中國長久以來富強夢想的努力。

薄一波引用鄧小平智慧的格言：「如果我們祇是模仿他國的經驗，我們永遠不會成功。」鄧小平在三〇年代指出，主張中國不應祇是蘇聯的複製。鄧在五〇年代進一步的說：「就整個黨的觀點而言，我們對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知識仍是不足；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仍有很多的盲點。」

這位被認為是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似乎並不能解決八〇年代以來的波瀾。在對外國高階人士的談話中，這位大家長承認「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輪廓已日益模糊。「我們並不確定社會主義將何去何從」，八〇年代中，鄧在談到由毛主席與他的手下在六〇與七〇年代所犯下左傾的錯誤時，如此告訴一位非洲的領袖。這位新時代的舵手所能提供唯一一件確定的事是，「社會主義並不代表貧窮」。

鄧小平手下的其他改革派們較鄧小平要來得更有意義。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Hu Yaobang)思想自由化的嘗試，不遑多讓於他在八五年底時所提出的馬克思之墓誌銘：「馬克思主義並不能解決今日所有的問題。」他的繼任者，趙紫陽(Zhao Ziyang)，相較之下少了點思想家的特質，善以迴避的方式來處理問題。趙私下的說：「對我而言，社會主義不過是國家擁有生產的方法，與根據每個人奉獻勞力的多寡來分配（給市民的）回饋。」暗示他寧可避開社會主義理論上的侷限。

鄧、胡與趙的開拓，在八七年十三屆黨代表大會背書的政治報告中得到具體的顯現，這也許是中共數十年來自我反省的巔峰。這場代表大會承認中國仍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階段」。它主張，依照孫博士的方式貫徹改革，也就是今日「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即使許多人相信在九五年初之前，中國將邁向已開發國家，但由薄、鄧、胡與趙所

提出的問題仍然令人驚恐。同時，這些問題背後也潛藏著危險：中共被潮流所淘汰與革命成果被竊取。

即使有「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國自天安門事件鎮壓後還是累積了相當的實力。預計中國人民所累積的財富與活力，將較趙紫陽執行集體失憶（就是忘了社會主義——不論它是蘇維埃或是中國式——祇要富有就好）時要來得更好。後鄧時期所將面臨的問題一如資本主義初期所將面臨一樣：如何建立能讓每個人與企業在公平基礎上競爭的規則。

中共所面臨的問題，漸漸著重在不被人民拋棄上，至於指引出國家富強之道，則反而是較次要的了。因為民眾，甚至是五千四百萬的中共黨員，越來越多人認為，中共的干涉與社會主義是阻礙發展最主要的瓶頸。

北京領導班子意識到思想與正統的危機。然而，當這股慌亂來襲，以總書記江澤民(Jiang Zemin)為核心的後鄧領導班子，卻拒絕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心態上展開激烈改革。在一九九三年末，數以百計針對鄧的思想之研討會將這種危機感更加擴大了，這些秘密會議的主題是，如何使用鄧的思想來解救今日的局面。但，鄧與他死後受益的領導階層，是否能夠順利傳承呢？

後鄧領導班子所將面臨的中國問題

本書審視從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劇之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隊與社會之發展，並預測其在邁進後鄧時代後它們的發展。貫穿的主題是：在鄧與其指定接班人掌控下的中共是否能處理這些問題？除了中共外，還有哪些社、經因素與部門將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依循著這條道路，中國在未來五或十年內將變為如何？

至少就表面而言，中國在九五年初表現得非常好，不但擁有超過五千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國內生產毛額，成為九四年全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外匯存底更達到令人眼紅的五百億美元水準。同年，中國大陸經濟享有全世界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即使有如北京市政府拒絕履行與麥當勞的租約這種令人難忍的例子，海外投資者仍蜂擁而入。同等重要的是，北京方面也不斷遊說西方讓它參加國際貿易組織，這點顯示它在採用市場經濟上又跨了一大步。

第二章描述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爲了重振經濟改革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在他一

九九二年初南巡後，包含了金融、吸引外資與私有部門之發展的改革都有大幅度的躍進，鄧其實是在執行「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政策」。然而，在一九九四年的改革卻面臨了瓶頸。很明顯的是從此之後，如果沒有相對應的政治自由化改革，社會與經濟成本將高得無法負擔。

鄧小平即將死亡這件事造成了中共政權更多的缺陷。中共的政治結構與文化仍多停留在三〇年代陝西省延安(Yon'an)窯洞的時期，而不是二十一世紀應有的。直到九四年底，整個領導中心仍由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工作」與「黨的重建」所占據，事實上也就是教化與宣導對黨中央絕對地忠誠。這些領導階層在政治自由化上，對於像胡耀邦與趙紫陽於八〇年代中期所提倡的黨政分離的舉動連試也不敢試（見第五章）。

在內部，中共欠缺不同派系能公開宣傳它們觀點的管道，並在平等立足點上競爭。由江澤民所領導的主流派，面臨來自於右派（主要是胡與趙殘留的支持者）與左派（毛澤東信徒）不斷的攻擊。教條主義與背地中傷，將日益腐蝕這個政治實體，許多優秀的幹部離開共黨以避免被捲入政爭之中。

在外部，共黨必需依賴軍隊與武警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即使在預算短缺且多數的行政部門面臨行政減肥情形下，數十億元的人民幣仍大把大把的砸給人民解放軍與

警察，軍人與警察的特殊權利被大幅提高。將軍們不但能全權處理生意，還對人民事務政策有相當的影響力（見第四章）。

無法重整政治結構的另一個結果是，在這個地區持續上升的緊張趨勢。在九四年與九五年初，江澤民的領導班子將權力自地方行政單位收回以鞏固他的地位。由於江澤民讓越來越多的上海幫政客們空降到北京，使得地方上政治創新程度越來越差。省、縣的首長經由加重的稅收也使得他們荷包滿滿的。到目前為止，這些地區所享有「做自己的事」的自主權，因要減少過熱的投資、提升穀物生產與阻絕投機行為如房地產而一一被撤銷。然而，沒有任何一個省或是城市有公開的反抗，大多數祇是在支持中央的舉動外繼續追求自己的目標。

更糟糕的是，中共無法現代化，這進一步侵蝕了它推動經濟改革的能力，在九〇年代中，北京當局要面對的是，要求既得利益者：包括工業、工廠與個人，無私、不斷地付出以促進改革的發展。其中包含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不可避免的是將會見到大批的員工被裁撤。一個受到群眾擁戴的政權在施政時，或許能採取較大膽的作風，它也許能說服民眾——一時的犧牲所換來的是長遠的幸福。如果有有效的溝通管道，甚至容許多元的社會參與政策的制定，這樣或許能減少政策在執行時所遭遇的困難與風險。

既然中共堅持在權力上是一個獨占、封閉且龐大的統治機構，它就注定幾乎無法承擔有風險的政策，尤其在鄧小平即將去世的這段時間中，特別容易造成民眾的不滿。中共所做的是對改革澆冷水，如同我們所將見到，江澤民的領導班子爲了維持穩定又朝中央計畫的方向走了回頭路。因爲害怕失業的群眾走上街頭，所以重整國有企業與成立合資公司的措施，在一九九四年底都慢了下來，價格管制與糧票又再度拿出來使用以對抗通貨膨脹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政治革新的停滯，造成企業的傷害與經濟全面的腐敗。由資深幹部的子女與軍隊官員所主持的公司，成爲邁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障礙，因爲他們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因此無法實現公平的競爭。且由於政治體系不透明與黨拒絕分享它的權利，在在都顯示出它的肅貪行動終將白費。

鄧小平與未來的中國共產黨

一九九五年元月在鄧榕(Deng Rong)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訪問中，這位大家長的第三女兒似乎對天安門的受害者表現出願意講和之意。鄧榕為鄧小平讓坦克車開進的決定辯護時，暗示了和解的可能性：「這將由那些後來的領導者所決定。」鄧小姐也為鄧在一九五七年楊右運動中所作所為提出道歉。她說：「許多那時成為鬥爭對象的其實是善良的人。」

期待從鄧小平的意志中流露一些和解的跡象是不切實際的。這位新時代的舵手，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學生示威中，將他自己推動的「思想自由化」停止了大半。鄧小平停止發掘在日漸多元化的社會中，中共角色應如何扮演的可能性。他開始灌輸陳舊的馬克思主義，包含無產階級專政之絕對必要性。如鄧小平在八七年告訴前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祇有社會主義能徹底解決貧窮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忍受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沒有中共則社會主義的建設將是不可能的。」

即使鄧小平在六四的災難後力求補天，他所有的治國策略仍祇是在黨的不同派別中力求平衡而已。爲了防止中國自亂陣腳，鄧以陰抗陽，用左攻右，以親市場經濟改革對抗祕密史達林主義者的國家警察機構。

在南巡中，鄧小平大力鼓吹他那套偉大、創新的理論即「不涉入於爭論」，意思是不選擇任何立場也不對任何意識形態的觀念著述。因爲害怕破壞了平衡，鄧小平總是在革命之際退縮。這位新時代的舵手，證明了他根本無法完成他自己有關於「換腦筋」與擁有邁入二十一世紀信心的指示（見第一章）。

期待江派有什麼大膽的創新也是一樣不切實際，在他心中除了保存既得利益外，再也沒別的事。江澤民藉由建立起隸屬於江澤民辦公室(Jiang Zemin Office)以下嚴格的層級關係，與頭重腳輕的黨結構來重振列寧的正統。在毛澤東對列寧教條所整理出的公式中，「民主的中央集體」就是「少數（的黨員）服從多數，個人服從團體，下級單位服從上級單位，整個黨服從中央。」如同在毛的時代，中央所指的就是政治局常設委員會或在多數的情形下，國家舵手他本人。

許多毛的治國主張在江的主導下一一復活，特別是如何對抗「和平演變」（泛指新西方帝國主義爲嘗試將中國轉變爲資本主義的附屬所做的努力）的方法。重振八十多萬

個中共黨支部的努力正迫切的展開，中央砸下大量的資源在對三、四十歲的年輕幹部所做的宣傳上，畢竟能將共產主義的聖火帶進二十一世紀的是他們這一群人。

第五與第六章將會仔細的描述各個領導者的潛力、長處與弱點，這些領導人包含了：

江澤民、總理李鵬(Li Peng)、副總理朱鎔基(Zhu Rongji)、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喬石(Qiao Shi)，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李瑞環(Li Ruihuan)與較他們更年輕的後繼者。另外，諸如上海幫、清華幫、共青團幫與蘇維埃大學(Alumni of Soviet Colleges)校友們的政治資源也都將被一一評估。

然而，無論是哪個領導集團接下鄧的擔子，都將必須滿足兩股來自於毛陰魂不散的力量。第一是由仍有勢力的左派思想旗手所構成的集團，他們想要阻止市場改革並回歸毛的「精神王國」(見第三章)。雖然他們似乎是無可救藥的過時，但他們仍可針對在企業改革中的失敗者提出訴求並獲得迴響，因為這些失敗者一直懷念毛那時的齊頭平等、沒有通貨膨脹的日子。

另一個在政治上可能造成障礙的是軍隊，也就是鄧小平用來對抗來自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鋼鐵長城」。江澤民自從在八九年底時成為中央軍委會的主席後，爲了將他的地位提升至一如在黨中一樣，江澤民給予人民解放軍前所未有的權力以曲意奉承

將軍們。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黨內「健康的力量」——除了胡耀邦與趙紫陽殘留的跟隨者，其中包含了大批轉為從商的幹部們——在江澤民統治告一段落後站到台前的可能性。期待某些非主流分子能展開內部改革，並導致中共的強硬派能逐漸的轉換為東歐式的社會主義政黨，這種發展的可能性在九五年初仍屬不確定。

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覺醒

革命並不是場晚宴也不是武裝叛變，它是一種心理狀態。不到五年就要邁入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真的已具有將自己推進到現代化的心理準備了嗎？這將是對鄧後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富強的關鍵與中共越來越無關了，大多數的創新將來自於社會學家所謂的「市民社會」（凡是黨以外的領域皆是）。一般認為多元的政治與文化是封建主義向前躍進的兩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而經濟與教育則是它的催化劑。

毋庸政府或中共的協助，中國人民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到九四年，私有企業與鄉鎮企業向國有企業展示了它們是國家產業主幹的實力。同年，由非國營單位僱用的勞動者達到一億兩千萬人，超過國營企業所僱用的。在九四年底，不計外幣兩百億美元，家庭儲蓄的水準便已達到兩兆元人民幣。即使是股票下跌，仍有超過一千萬的股民每天進出股票市場，大量的金錢與賺錢的技巧表明了西式的中產階級已在各個城市中出現。

而教育又如何呢？理論上來說，九四年中國撥給教育的款項仍是相當的少，總計為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六六。但是，對於資源較多的城市居民而言機會仍是相當多。來自香港與臺灣投資的私人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的興盛。更重要的是在廣義上的教育發展：由於資訊革命擴大了與外面世界的接觸。經由衛星電視、國際直撥電話、傳真、數據機與國際學術網路，北京藉由微軟與其他軟體界巨人的協助，花了將近一百億美金來建構資訊高速公路。

知識與金錢的結合導致整個重心漸漸的從中南海、中共北京總部，轉移至市民社會。企業家、專業人士與具有獨立消息來源之知識分子相結合，更進一步地確認了中共的不切題與即將過氣。

市民社會挑戰這四十六年傳統派執政的方法有很多。首先，它追求的是與共產主義